

第6卷第1期 2013年2月

Vol. 6, No. 1, February, 2013

国际高等教育

国际问题

年轻大学可以达到世界一流吗? 1

新一周, 新丑闻: 移民困境和政治混乱..... 4

高等教育国际化

重新审视国际化的概念..... 7

绘制国际化版图: 活动加速、结果不一..... 9

海外分校校舍所有权的五种模式..... 11

高等教育的经济挑战

高等教育可否负担得起? 14

用更少的政府资源满足日益增涨的教育需求..... 17

亚洲地区的高等教育

柬埔寨高等教育: 次级学位? 19

尼泊尔高等教育: 公立与私立的较量..... 21

那烂陀大学终极版: 印度比哈尔乡村有可能发展世界一流大学吗? 23

非洲地区的高等教育

卢旺达的高等教育发展..... 25

非洲学生在印度的流动模式..... 27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

西巴尔干半岛高等教育问题分析..... 30

日本的大学应该改变大学学年安排吗? 33

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影响高等教育选择: 秘鲁的案例..... 35

新书速递 37

年轻大学可以达到世界一流吗？

Jamil Salmi

全球高等教育专家、前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高等教育主管

电子邮箱：jsalmi@tertiaryeducation.org

如果一所大学没有百年历史，它还有机会跻身卓越大学之列吗？2011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前十的学校，它们的建校时间都在1900年以前，有两所甚至有超过800年的历史。就如同好的红酒一样，学术卓越需要知识的积累、精心的照料和长期的酝酿。

然而，这种观念如今却遇到了挑战。首先，每年定期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似乎可以说明，学校的表现每年都会有巨大的进步。第二，一些国家通过“卓越计划”重点投入顶尖大学建设的政策决议，也显示了它们想要在几年之内取得巨大进步的决心。最后，哈萨克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新兴经济体近来新建了一批大学，这显示了他们想迅速成为“世界一流”的雄心。

《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的首个“Under Fifty”排名列出了世界上最有潜力的新兴大学，那么，人们是否可以相信，一所大学加速发展成为顶尖大学是现实可行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针对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挑战，梳理了新近相关的文献和研究。

传统的分量

已有的分析世界一流大学杰出成果的概念框架——备受追捧的毕业生、前沿研究和活跃的技术转让——强调了三组相辅相成的关键因素：（1）人才汇聚（优秀教师和学生

高度集中），（2）教学资源丰富，科研经费充足，（3）优化治理，激发出战略愿景、创新和活力。

审视这些因素，我们可以发现：获取所需的学术和财政资源，并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显然没有捷径可走。发展深厚的卓越文化，特别是卓越的研究文化，是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不断进步和固结的结果。

但是，悠久的历史并不能保证学术卓越。首发于2003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某些历史悠久的学校并未获得与其历史相称的国际声誉，如博洛尼亚大学（Bologna University）只排在201~251名、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 University）排名第58，巴黎大学（Sorbonne University）则排名第65。与那些具备世界一流大学基本要素（充裕的资金、现代化的管理、研究人才和大学自治）的大学相比，它们显然缺乏竞争力。

快速的行动者

《世界一流大学：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大学案例研究》（*The Road to Academic Excellence: The Making of World-Class Research Universities*）一书选取分析了四所仅用了几十年就取得了卓越地位的新兴大学。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和《泰晤士高等教育》的“世界大学排名”的标准筛选，这四所大学分别是：印度理工学院（the 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新加坡国立大学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中国香港科技大学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和韩国浦项科技大学 (the Poh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在《泰晤士高等教育》的“Under Fifty”排名中, 韩国浦项科技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分别名列第一和第三。

从一开始, 香港科技大学就受益于有利因素的独特组合。在香港回归的关键转型时期, 香港科技大学建成了, 它的特点在于: 有清晰的愿景、强有力的领导、杰出的学术队伍、一个创新的教育模式、充足的资源和一个有力的治理框架。

这个例子会不会太特殊而不能提供有用的经验教训呢? 《世界一流大学: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大学案例研究》中的各个案例都强调了重要的通用元素。在支持追求卓越的关键“加速因素”中, 最具影响力的似乎是大学对海外人才的依赖。正如浦项科技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案例中所显示的, 吸引海外学者归国是迅速建立大学学术力量的一个有效方法。而案例研究的第二个元素是将英语作为主要的学术语言, 这大大提高了一个机构吸引高素质外国学者的能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成功做到了这点。

专注于细分领域, 如科学和工程学科, 是第三个能促进一所大学迅速达到世界一流大学临界值的方法, 浦项科技大学、印度理工学院和香港科技大学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f Zürich) 和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f Lausanne) 这两个最活跃的欧洲大学也同样是工程院校。

第四个方法是使用标杆法定位一所大学应从哪些方面完善自己。例如, 上海交通大

学首先通过与中国顶尖大学细致比较锚定其战略规划工作, 随后又以外国同类大学为标杆进行绩效评估。

最后一个快速改进的方法是引入课程和教学创新。例如, 香港科技大学是香港地区第一所美国式的大学;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 (the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是第一批将教学和研究整合在一起的俄罗斯大学之一。这类敢于创新的特色, 是后发优势的一部分, 在新兴大学与传统大学争抢生源的过程中至关重要。

《世界一流大学: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大学案例研究》对这些高校发展轨迹的分析表明, 建立一所新大学比试图升级现有大学更容易达到世界一流。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现有大学不能获得巨大改进, 而在一个不具有繁荣卓越文化的地区创建卓越则是更具挑战性的事情。丹麦奥胡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Aarhus) 在一位具有创新意识的校长的带领下, 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这位校长倡导“未雨绸缪”的改革, 就和南太平洋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副校长领导下的“好但还不够”的战略变革是一致的。

结语

今天的一流大学就如高品质红酒一样, 受所谓“年份”因素的影响。但是, 近年来, “高等教育是国家竞争优势体现”的这一观点已经改变了政府看待大学角色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人相信, 通过适当的领导和充裕的投资, 现有的大学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彻底转型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虽然这并非不可能, 但是相比从零开始发展一所新大学, 通过升级创造一所顶级大学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无论走哪条路，打造卓越仍是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需要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策略方法。即使是那些能够利用本文所提到的一些有利因素的机构，也应该牢记：美酒的味道和质量可能因为年份的关系而发生变化；但是不同的是，一所追求学术卓越的大学应该坚持并保持长远的目光。正如丹尼尔·林肯（Daniel Lincoln）最近写道的：“追求卓越，和追求所有具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一样，是一场持久的马拉松，而不是短跑。”

作者注：本文来自作者 2009 年出版的《世界一流大学：挑战与路径》（*The Challenge of Establish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以及 Philip Altbach 和作者 2011 年共同编写的《世界一流大学：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大学案例研究》（*The Road to Academic Excellence: The Making of World-Class Research Universit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新一周，新丑闻：移民困境和政治混乱

Philip G. Altbach、Liz Reisberg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Liz Reisberg: 高等教育顾问

电子邮箱: liz@reisberg.org

本文已发表在 2012 年 9 月 16 日的《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 上。

在主要的留学生接收国中，有关国际学生移民监管的变化似乎多少有些不可预测。在几个英语国家，移民监管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最近，国际学生频受打击。这些变化有可能改变全球学生流动，甚至可能减缓过去 20 年来留学生人数增加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最近几年的扩张实际上有可能只是暂时的“泡沫”。

最近的丑闻

最新的危机涉及英国伦敦城市大学 (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这所大学是英国最大的留学生接收院校之一。英国边境管理局 (the UK Border Authority) 撤销了该校“高度信任”的评级，因为审计显示，大量的留学生不具有留在英国的证明文件，英语水平差强人意，或者并未注册入学。其中部分学生可能会被遣送回国。其他合法注册的留学生则陷入了恐慌。伦敦城市大学很大比例的留学生来自印度。正如一位在英国从事留学生安置的公司经理解释的那样 (引用自《卫报》[Guardian] 的报道): “我们把市场分为两类，吸收真正学生的大学市场，

以及移民市场。”移民局面临的挑战是，当这两类市场的人群都持有学生签证时，如何区分他们。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伦敦城市大学的情况只是英国招生和招聘问题中的冰山一角。

还有几个丑闻也已经成为美国国内媒体的头条新闻。2012 年 8 月，加州核关大学 (Herguan University) 的负责人因为签证欺诈的罪名被捕。这与三谷大学 (Tri-Valley University) 的案情类似，他们都主要服务于那些不以学习为目的的印度学生。两所大学似乎都以“签证工厂”的运营方式而盈利。由于两者都没有获得认证，人们不禁在思考：为什么这些大学会被授予发放学生签证的资格。

但行为不端也分不同程度，并不是所有的不端行为都会受到即时和严厉的处置。美国国务院去年五月决定，600 名隶属于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的教师因证明材料不足，必须立刻离境，重新申请签证后才能返回，此举引发了混乱。孔子学院老师的事件并非欺诈行为，而只是由于对令人困惑的签证规定无辜误解而产生的。最后并没有教师被驱逐，但是美国国务院处理事件的方式差

点造成重大的外交纠纷。

政治压力和政治回应

个人出入境行动似乎被笼罩在“完美风暴”的担忧之下。在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移民问题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政治话语中。或许在应对因经济衰退造成的失业以及大众的保守趋势时，移民已成为许多国家的政治“敏感事件”。例如，英国制定了减少移民进入该国的政策目标；在欧洲许多其他国家，移民是一个政治敏感话题，常常被民粹主义者作为一个重要的挑衅议题；美国的很多州也将非法移民作为政治焦点。

澳大利亚似乎在想要更多还是更少移民之间摇摆不定。今年早些时候，即将毕业的留学生获得了允许，无论其从事何种类型的工作，都可以继续在澳大利亚工作两到四年（多于之前18个月的限制）。

马来西亚希望吸引更多的外国留学生，但最近推出了新的限制措施以控制学生数量。政府现在要求学生证明自己在进入马来西亚之前已经被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录取了，同时要求留学生在第一年学习马来语，并购买医疗保险。这些新措施代表了监管更严格的国际趋势。

越来越多的政府担心，留学生的流入需要更多的监管和控制。过去，学术机构在录取留学生和发放学生签证方面有很大的灵活性。移民局信任学术机构能确保只有合格的、合法的学生才可以获得签证推荐。最近的事件表明，一部分教育机构，通常是那些高度依赖留学生获得收入的机构，可能会利用自己身为守门人的自由，违背法律精神而行为失当。

保护了谁？

留学生在这种环境下很容易成为靶子。作为一个过渡群体，他们不够成为一股政治力量，或创建一个游说团体为自己说话。但重要的是，相比其他临时访客，留学生很难称得上是一种威胁。不像那些入境后不能被追踪的旅游者，留学生注册在教育机构中，他们的资料也随之进入移民数据库。

留学生也特别容易被人利用。面对令人困惑的和不断变化的法律，他们只能勉强去理解，孔子学院的情况就表明了这一点。这些学生和学者可能会接受别人的建议（并且经常为此付出代价），但是那些给予建议的人们可能并没有将学生的最佳利益放在心上。留学生也不太可能知道自己在另一个国家可以获得的权利和保护，这在澳大利亚引发了担忧：无良雇主可能会利用新增的工作特权剥削外国工人。

政府需要预防签证项目免受滥用，学生需要得到应有的保护以免受到来自滥用签证者的伤害。

新思潮

近年来，国际高等教育版图已经发生了变革，因此更有必要仔细审核学生。一些学术机构依靠留学生学费来平衡预算。在这些机构，国际学生已经成为挨宰的“金牛”。澳大利亚是最好的例子：几十年来，政府相关政策一直鼓励通过留学生盈利。虽然美国没有相关国际投资的国家政策，但有几个州，尤其是纽约州和华盛顿州，它们已经决定实施将来自留学生学费的收入纳入公立大学的财务策略。在一些大学，由于传统学生市场中人口结构的变化，留学生现在代表了招生

短缺和学校生存之间的抉择。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留学生接收国欢迎留学生，却也并未沾染浓厚的“商业化”气息。例如加拿大，尽管它向留学生收取更高的费用，但也允许高技能的学生毕业之后继续留在该国。在加拿大，留学生保证了人才流入，也带来了额外的收入。德国、挪威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不向国际学生收取学费。

高等教育国际化为一些国家带来了新的商业机遇，在这些国家，大学自治是一项传统。大学的领导人代表了新思潮，更加关注收入而不是教育的完整性或质量，它们可以自由包容各种类型学术活动的开展，如招生、学生督导、学位资格，甚至那些质量极其低劣的项目。

在那些将留学生招生事务外包的、并为中介和招聘人员支付佣金的大学，这种风气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引入第三方招聘人员增加了大学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层次，同时，移民局也有了额外的理由担心学生们是如何被审核入学并获得签证的。

解决问题

对于政府针对留学生和其它国际高等教育方面的额外限制，学术界普遍持消极反应。几乎没有人承认问题的严重性，或者对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将减少国际招生人数及塑造“不受欢迎”的海外形象的现状表示关切。

问题在于，移民和边境执法机构倾向于运用缺乏细节说明的法律和官僚规则来处理问题。考虑到在数以百万的留学生中，大多数都是合格学生，能在智力上和经济上为接收他们的学校做出贡献，因此，接收国应该谨慎对待移民政策的戏剧性变化。当个人在违反了移民法规的情况下进入一个国家时，他们应该受到制裁。当院校忽略规则或录取了不合格的学生时，学校也应该受到惩罚或承担法律责任。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应该关闭，这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政府确实需要引入一些额外的惩罚措施来管理国际高等教育，特别是在经济利益可能决定机构政策实践的情况下。但是，也不能不加以区别地惩罚每一个人。

重新审视国际化的概念

Hans de Wit

荷兰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 (the 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教授、意大利卡托尼卡·萨克荣·库雷大学 (the Università Cattolica Sacro Cuore) 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j.w.m.de.wit@hva.nl

国际大学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已经开始反思国际化的过程和实践, 以定位国际化及其对全球知识社会的潜在价值 (www.iau-aiu.net)。对于国际化的概念, 不仅要重新审视, 人们还应该回到它原来的意义和基础, 理解哪些语境因素正在影响它的原有意义、哪些因素需要进一步调整。

一个相对新的概念

与许多人所认为的相反,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兴起还不足 20 年。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使用的术语是“国际教育”(international education)。这是一个概括性的词汇, 而不是一个概念, 指的是一连串分散的、不相关的高等教育国际活动: 留学、外国学生辅导、学生和员工交换、发展教育和区域研究。过去的仅仅 20 年间, 人们就可以观察到“国际教育”向“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不断转变, 以及国际化概念的产生。

铁幕的倒下、欧洲统一的进程, 以及经济和社会的日益全球化——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分散边缘的“国际教育”概念转变成一个更为统一全面的“国际化”的概念。

为什么现在重新审视此概念?

如果国际化仍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

念, 那么就需要在大量主要因素的基础上进行反思。首先, 有关国际化的讨论似乎并不总与现实紧密联系, 而更多的是国际教育的同义词, 譬如总结一些零散的、不相关的名词, 而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和概念。从这个角度, 人们必须考虑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Foreign Student Affairs) 的报告——《全面国际化: 从概念到行动》(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ization: From Concept to Action, 请见 www.nafsa.org/cizn, 由 John Hudzik 主笔)。这份报告除引入了新的概念, 更多地是起到了敲响警钟的作用。全面国际化是一个同义反复: 国际化如果是不全面的, 那就不是国际化, 而是老式的国际教育。

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商业化的增强以及全球知识社会和经济的概念, 都导致了一系列新的形式、服务提供者和产品 (比如分校、特许经营和教育服务贸易) 的形成。此外, 作为现有的结果, 一些甚至相互矛盾的维度、观点和元素也在国际化的谈论中兴起。

同时, 国际高等教育的环境也正在迅速变化。直到最近, “国际化”还像“国际教育”一样, 主要是一种西方现象, 发展中国家只扮演了一个被动的角色。世界其他地方的新兴经济体和高等教育共同体都在改变国际化

的版图。一些教育家将“国际化”的概念从西方的新殖民主义概念中抽离，并将这些新兴的观点吸收进来。

去国际化？

非洲拥有数不清的具有外国学位的学者和具有海外学习经验的毕业生，也从国外引进知识和概念，该地区可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拥有更为国际化的教育。但是，那种环境并不一定发挥着积极的影响，非洲国家要想在全球知识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它们首先需要经历去国际化的过程，将其自己从一些外部影响中解放出来。

此外，一小群利益相关者过于主导了有关国际化的论述，他们是高等教育的领导者、政府以及国际组织。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如专业领域尤其是教师和学生发出的声音却较少获得关注。因此，最受国际化影响的人却并未能对有关国际化的讨论产生足够的影响。

联系前面的观点，也即是说，太多的话语是面向国家和制度层面的，而很少关注项目层面的研究、课程设置和教学过程——而这些应该更接近国际化的核心，正如“国内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运动

所体现的那样。

对必须的道德伦理给予更多关注

国际化过于关注输入/输出的定量数字，而不是以结果为导向。同时，相关话语太少关注国际化实践的规范、价值观或伦理等问题。该方法过于目标导向，太务实，没有讨论潜在的风险和道德后果。最近一些针对美国中介的文凭欺诈和跨境教育缺乏质量保障的辩论说明，需要更多地关注国际化的道德和价值观问题。

最后，促使重新考虑国际化概念的是人们对此概念更深刻的认识：国际化不仅关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重视文化之间、全球和地方之间的关系。

所有这些观点都是重新审视国际化的出发点。其中的原因包括，高等教育国际化被更多地认为是一个目标而不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国际化是一个提高教育和研究质量的策略。这个目标在追求定量目标的过程中被遗忘了太多。国际大学协会发起的反思运动不仅仅在于重新定义这个尚且年轻的概念，还必须呼吁采取行动，为国际化注入核心价值观和目标。

绘制国际化版图：活动加速、结果不一

Patti McGill Peterson、Lindsay Mathers Addington

Patti McGill Peterson：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全球行动总顾问

电子邮箱：PPeterson@acenet.edu

Lindsay Mathers Addington：美国教育理事会高级项目专家

电子邮箱：LAddington@acenet.edu

只有了解美国高等教育机构自身是如何发展国际化的，才能更好地达成教育目标，将学生培养成能在日益国际化的社会中生存发展的人才。为达成该目标，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全面的国际化路径非常重要。

美国校园中的国际化

为了分析美国校园中的国际化现状，美国教育理事会最近调查了全美得到认证的院校，对其国际化现状进行了评估，并分析了自上次（2006年）开展研究至今，学校所取得的进步。作为十年内的第三份报告《绘制美国校园的国际化版图：2012版》（Mapp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U.S. Campuses: 2012 Edition）代表了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有关国际化的唯一综合性数据来源。

这项研究调查了院校在六个关键领域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努力。该研究基于国际化与全球参与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 Engagement）对“综合国际化”的定义，即指在沿着几个维度调整和整合国际政策、规划和计划的一体化过程。这包括清晰的制度保障；行政结构和人员；课程、辅助课程、学习成果；教师政策和实践；学生流动；以及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

综合国际化的积极进展

2011年的数据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在于，院校对自己校园中开展的国际化活动的认知程度很乐观，多数院校都报告说正在努力提高校园的国际化程度。

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课程方面的国际化。2011年，要求本科生修一门有关全球趋势和问题的通识课程的院校数量略有增长（4%），发展全球学生学习产出的增长步幅更大，2006年以来增加了10%。有这些成果的院校中，多数通过课程评估或专业评估来测评效果。评估过程强化了国际化的制度化保障。这些都是课程国际化的积极信号。

在一些没有明确国际化或全球化的领域中招聘教师时，越来越多的院校考虑申请者的国际背景、经验和兴趣等。68%的院校表示，它们有这种偏好，然而2006年只有32%的院校这么做。教师在全面国际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全面国际化的最终目标则是学生学习的国际化。教师聘任是学校认可教师在国际化过程中的权威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学生流动仍然是一个焦点，更多的院校将资金和资源投入这一领域。为学生提供奖学金，将学生送到国外学习的院校也更多了。2011年，90%的博士教育机构都有这种经费支持，三分之二的硕士和本科教育机构以及

四分之一的其它机构有这种经费支持。此外，与前几年相比，越来越多的院校正在资助教师将学生带到国外交流。从其他角度——留学生的流入——审视学生的流动性时，更多的院校也在为此投入资源。2011年，大多数博士、硕士和本科教育院校都为国际本科生提供奖学金和其它经费资助，更多的院校为教师提供招收留学生的差旅资助。总的来说，31%的院校都有这种差旅资助——其中，博士教育机构最高（78%），特殊类别的学校最低（13%）。

即使考虑到过去数年高风险的预算压力，院校仍然意识到教育全球化对学校愿景使命的重要性。在那些自2008年以来就加快了国际化进程的院校中，相关经费则有所增长或者保持稳定。然而，尽管一些领域投入了资源、并取得了进展，但调查也揭示了美国校园可以进一步改善的地方。

全面国际化的关注点

尽管人们对国际化的看法是非常积极的，而且在某些领域也看到了改进，但一些结果显示，现实并不那么乐观的。

有关课程的数据中有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这引起了对于课程设置应该追求广度还是深度的问题的关注。尽管提供有关国际问题课程的院校数量稍有增加，但所有类别的院校中，要求本科生学习有关其他国家和地区问题和观点的课程的院校数量却在减少，同样地，要求本科生学习外语的院校数量也在减少。如果院校对学生的全球学习目标很慎重，这些都是必要的学习领域。

尽管招聘具有国际背景的教师院校数量有所增益，但是支持教师增加国际知识和技能院校数量则有所减少。例如，2011年，资助教师海外学习和研究的院校数量减少了，提供校内国际化课程研讨会的机会减少了，院校数量与2006年的8%一致，保持不变。这与院校将上述因素纳入教师招聘的意愿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

虽然学校越发努力招收国际学生，但数据显示，学校对这些学生的支持服务或者促进他们与同龄的美国学生的互动和互相学习的活动却并未相应增加。全面国际化需要细致规划，对国际学生的校园生活进行整合和支持。

结语

在预算紧缩和竞争加剧的时代，院校显然必须将自己的国际化活动和计划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报告数据证实了这一点，一些院校正采取行动，提高校园的国际化水平。然而，要想实现全面的国际化，大学需要郑重承诺，学校的高层领导和师生也都要倾力支持。而这并非是仅仅专注于一两个零散因素就能达成的。

我们不能停止不前，美国高等教育界还需发展和分享成功的全面国际化模式，扩大传统范式，并同时创造新的方式，将全球学习带给非传统的学生群体。最后，院校的国际化战略也需体现出全球环境的迅速变革。

报告和相关资料下载，请见：
www.acenet.edu/go/mapping。

海外分校校舍所有权的五种模式

Jason E. Lane、Kevin Kinser

Jason E. Lane: 美国洛克菲勒政府研究所 (the 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教育行政管理
和政策副教授、教育研究主任,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跨境教育研究小组联合主任

电子邮箱: jlane@albany.edu

Kevin Kinser: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教育行政管理和政策副教授、教务长助理、跨
境教育研究小组联合主任

电子邮箱: kkinser@albany.edu

设立海外分校 (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 可能代价高昂。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在另一个国家建设和维护校舍设施的花费。事实上, 一提到海外分校, 许多人想到的是在国外沙漠丛林中建立的学校本部 (home campus) 的小型复制品。然而, 只有少数校园的建筑、设备等达到了高等学校的要求。虽然这些海外分校都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完整校园, 但是许多学校实际上并不真正拥有这些校舍。例如, 诺丁汉大学在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分校都复制了和英国本部校园一样的标志性的钟楼, 但钟楼的所有权并不属于学校。

我们对海外分校进行实地考察后, 总结了不同类型的校园。其中, 一些学校有许多建筑楼群, 一些学校只有几间房间。有些是租来的, 有些则完全属于学校本部。还有一些学校利用合作学校所提供的空间, 但这并不属于学校本部所拥有的或者租用的。然而, 关于这一议题的信息多数都是传闻。所以, 在开展海外分校国际调研时, 校园的“所有权”作为特别问题被提出。

调研方法和海外分校的定义

调研于 2011 年秋天展开的, 问卷被分发给 180 所院校。这些学校都符合以下对海外分校的界定: 该分校全部或部分属于外国教育提供方, 以该外国教育提供方的名称运营, 开展面对面的教学活动, 学生完成整个课程后可以获得外国教育提供方所颁发的文凭。唯一与校舍相关的定义是, 海外分校必须有面对面教学的物理位置和空间。定义中所指的所有权是指对企业实体的所有权, 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校园的所有权。每个调研学校都需要描述它们对校舍的所有权范围, 然后他们的书面回复将成为数据分析的资料。

调研共收到 50 个海外分校的所有权信息。研究结果揭示出五种基本的所有权模式: (1) 完全由学校本部所有, (2) 从私立部门租借, (3) 归当地政府所有, (4) 为私立合作伙伴所有, (5) 为教育合作伙伴所有。

完全拥有

最常见的是校舍完全由学校本部所有 (共有 14 所海外分校属于这种模式, 占

28%)。这有点令人惊讶,因为这种所有权模式的相关经济风险最大。新建校园建筑的成本相当昂贵,如果出现差错(例如入学人数下降或政府变更了法规),校园被迫关闭或者被改变,可能难以收回沉没成本。然而,它也可以提供某种程度的稳定,因为学校本部没有必要与另一个组织协调校舍的使用或维护。这也降低了合作伙伴试图利用他们的所有权影响学术运作的可能性。

政府合作伙伴

第二常见的是校舍建设成本是由当地政府负担和所有(共有11所海外分校属于这种模式,占22%)。这一模式似乎在那些将海外分校视为经济增长战略的一部分,并希望以此作为诱因吸引特定大学的地方最普遍。按照各个国家的情况,所有权可能归当地政府所有,或者归国家政府所有。在卡塔尔,“教育之城”的发展策略与校园设施建设均由卡塔尔基金会(the Qatar Foundation)负责,该基金会由国家政府支持。在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欧洲一些国家,也有地方或国家政府投资建设校园设施以此吸引外国大学的例子,这同时也支撑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事实上,至少能够找到两个例子反应,国家政府拒绝为建设一所新的公立大学提供支持后,地方政府会挺身而出为海外分校建造校舍。

私立投资者

第三大所有权模式是外国院校与当地私立合作伙伴共建(共有10所海外分校属于这种模式,占20%),私立合作伙伴常常是投资公司或地产开发商。在这种情况下,私立合作伙伴有时从海外分校的收入中抽成,或者将海外分校作为“便利设施”促进房地产的销售。

租借

有9所海外分校(占18%)的校园空间是租借来的。其中两所大学位于欧洲,多数海外分校则位于迪拜知识村(Dubai Knowledge Village)和迪拜国际学术城(Dubai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ty),这两处都是为外国院校租借校舍而建的。在这种模式下,各院校在同一个地点租借相似空间,创造出一种“购物中心”的效应,这样学生就可以有多种学习选择。从成本来看,学校除了租用空间还必须支付装修和设备费用。在某些情况下,租借似乎是一个过渡阶段,因为一些院校后来都会建立他们独自の校园建筑,搬出附近的租赁校舍。

学术合作伙伴

最后,海外分校建在另一所大学的校园中(共有6所海外分校属于这种模式,占12%)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模式。这种伙伴关系主要出现在亚洲和中东地区,但是由于合作学校之间没有任何学术合作关系,因此这些项目并非双学位或者联合学位项目。相反,海外分校利用这些学校的校舍,开展独立的学术项目,它们与这些大学是分开运营的。

结语

“海外分校”这一现象说明了所有权或校舍条件的重要性,而目前大多数的定义都只是要求该分校在他国实体存在即可。我们的这项调研结果表明,海外分校实际上以形形色色的规模和形式存在,有的租借校舍,有的使用政府补贴等等。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归结出海外分校实体的五种模式。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模式的使用是有限的,这取决于当地的规定(比如一些国家不允许他

国具有校设的所有权), 以及找到一个愿意提供空间的政府、私立机构或学术合作伙伴的可能性。每种模式都面临机会和障碍。对校舍的完全所有权从某种程度上能保证稳定性和自由, 使其免于外部干扰, 但是一旦学校不能招收到预期的入学人数或者面临当地政府的冷淡对待, 也将面临金融风险。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减少金融风险, 但可能导致外界干涉学术事务等。尽管本调研总结出了校舍

所有权的模型, 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后续研究来理解这些模式的操作意义。

《国际高等教育》每期发表一篇来自跨境教育研究小组 (the Cross-Border Education Research Team) 的文章, 更多关于跨境教育研究小组的信息请参见 www.globalhighered.org。

高等教育可否负担得起？

Sandy Baum、Saul Schwartz

Sandy Baum: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教育与人力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电子邮箱: sbaum@gwu.edu

Saul Schwartz: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 (Carleton University) 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学院教授

电子邮箱: saul_schwartz@carleton.ca

高等教育从精英阶层的特权演变成大众经济和社会生活必需品的过程中, 为学生及其家庭带来新机遇的同时, 也带来了财政挑战。政府可以为少数人提供了免费或低价的大学入学学习机会, 同时也发现, 虽然不太富裕的公民也十分渴望接受高等教育, 但提高学费却是必要之举。在许多国家, 包括加拿大、智利和英国, 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学费政策。在美国, 学生虽然不那么激进, 但是和其他地方一样, 不断上升的大学学费和停滞的收入使这样一种观念广泛流传: 高等教育已使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承受”。

然而, “无法承受”的含义并不甚明确。到底哪些费用是相关的——高等教育公开的学费价格, 人们实际支付的费用, 还是人们预期应该支付的费用? 如果政策制定者不能清楚地理解“负担得起”或“无法承受”的教育意味着什么, 扩大教育机会的努力就可能因此受到阻碍。

学费支付能力的主观性

如果人们没有足够的现金支付定价要求的价格, 那么客观来讲, 这些人是不具备购买力的。虽然一些潜在的大学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但由于政府资助的学生贷款和拨款覆盖的范围很广, 绝对受限于学费的现

象不再那么常见。然而, 人们仍旧认为自己负担不起高等教育的费用, 因为高等教育学费昂贵, 需要牺牲其他的商品和服务消费, 或者还会因此负债。

因此, 支付能力是主观的。一些父母为了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也有一些拥有资源的父母并不愿牺牲当前的消费, 为收益尚不明确的高等教育付费。这些父母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他们的收入, 还在于他们的消费偏好和优先权。

此外, 要根据现状判断学生的学费负担能力。北美地区, 魁北克的学生学费是最低的, 但今年春天学费利率提高时, 他们也走上了街头进行抗议——尽管当地的收费很低。德国各州也于2006年引入了学费, 但德国学生的抗议使学费在某些情况下又被免除了。

净价

人们对高等教育学费的认知常常由于它的公开“标价”而扭曲, 但实际上许多学生最终支付的学费比“标价”要低。政府资助的拨款援助、大学奖学金、税收抵免、通过补贴贷款延期付款以及其他来源的补贴等政策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学费体系, 这明显降低了一些学生的教育成本, 但也使预测、了解

学费变得非常困难。

净价和实际价格之间的差距可能会很大。可获得的最新数据来自2007/08学年，该学年美国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获得了足够的拨款援助，平均能涵盖公立两年制和四年制学院所有的学杂费。尽管如此，这些变化却仍无法改变人们的一些看法，大家都认为：学费上涨使大学变成了最富裕学生的乐园，高等教育不再是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了。此外，由于缺乏对净价概念的理解，大量证据表明，大多数人高估了高等教育的价格。政策制定者必须深思熟虑，确保人们确实能够负担得起高等教育，并不再对高等教育的价格望而却步。

高等教育是一种投资

关心支付能力的理由之一在于，高等教育可以为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因此，长期来看，这点有助于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能力。这种观点暗示着，高等教育是值得学生投资的。在收取高额学费的国家中，关注学生的负债能力可以促进有关人们是否负担得起高等教育的讨论——而这并非是父母当前有多少收入能用于负担子女大学一年花费的问题。

许多学生借钱来支付高等教育的费用。平均来看，这些学生可以通过教育的收入溢价偿还贷款。然而，尽管高等教育的平均回报率很高，但是个人收入因其教育层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大学无法保证每个人的高等教育回报率都很高。虽然预期的高回报足以使上大学成为一个还不错的经济选择，但低收入的风险和难以应付的债务负担都会降低高等教育对潜在借款人的吸引力。投资的风险将影响人们对自身负担能力的认知。

虽然从投资角度来看，只要不限制学生

借款的数额，家庭收入将不再与学费支付能力相关；但是，富裕的父母能为子女提供资金，减少子女的贷款。在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中，无论是从父母或其他来源，所有学生都应该能获得同等数额的补贴。对于父母的支付能力不足的学生，政府和大学应该填补他们的资金缺口。

结语

鉴于政策制定者试图在一个物价上涨、政府预算紧张、家庭资源有限的环境中解决高等教育的经费问题，思考所谓“负担得起”的高等教育意味着什么就变得尤为重要。

支付能力是主观的，它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以及可利用的资源价格。此外，对价格高低的判断还取决于家庭的期望，以及对学生和社会之间教育成本分担问题的看法。这同时也与现状有关，当原本较低的学费被提高后，人们对支付能力的关注也将增加——即使与其他更高的学费体系相比，增加后的学费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尽管许多学生和家庭都面临着难以支付学费的现实困境，但人们对支付能力的认知状况有时甚至比现实更糟——因为学生和家長都认为公开的学费价格高于实际价格，他们并未意识到能够利用的财政资助力度到底有多大。

高等教育是一项平均回报率很高的投资，但其回报情况并不确定，也并不总是积极的。经济疲软增加了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和投资回报周期。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使高等教育显得让人“无法承受”。

高等教育的成本和风险对于那些家庭无法为其提供资金支持的学生最为不利。对于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说，为其提供拨款援助可以代替他们父母的资金支持，

减少低收入家庭学生因数额更大的贷款而面临的额外风险。

相关论文参见《面相高等教育支付能力的现实观念》(Toward a Realistic Conception of Postsecondary Affordability) (请见：

http://gsehd.gwu.edu/documents/gsehd/research/Working%20Paper%20Series/WPS2.2_Baum_web.pdf) 以及政策摘要 (请见：<http://www.ihep.org/publications/publications-detail.cfm?id=156>)。

用更少的政府资源满足日益增涨的教育需求

Arthur M. Hauptman

高等教育政策咨询专家

电子邮箱: Art.Hauptman@yahoo.com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所带来的挑战。只有一部分国家,如挪威、沙特阿拉伯等国,已经决定并且能够投入足够的公共资源,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资金需求。然而,对于大多数国家,未来如何通过更少的公共资源来维护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制,仍存在挑战。

应对这一挑战有三种基本策略:提高公立高等教育的价格,以抵消公共资金的约束;提高资金效率或招收更多学生,以减少生均资源支出;鼓励私立院校的扩张,以减轻纳税人对高等教育承担的支持压力。

在考虑这三种策略的优缺点时,有一点很重要:要认识到困境、做好权衡,也就是说,同时做到扩大入学机会并提高质量是非常困难的。由于扩大入学机会的政策常常有损质量,所以那些可能改善质量的行动常常要靠限制入学机会来达成。

此外,在扩大入学机会和保障质量方面,高校和政府的角色之间往往发生冲突。维持或改善质量是大学领导和教师的首要任务,他们希望将生均资源最大化。相反,政府官员的首要目标则是保障或扩大入学机会,因为他们想要将入学机会最大化并通过将生均资源支出减到最低,以此来提高效率。因此,在公共资源稳定不变或者减少的情况下满足需求日益增长的问题,由于高校和政府两者传统角色和责任的不同而复杂化了。

增加学费

大多数国家处理公共资源限制最常用的策略是增加来自学费和其他费用的收入。这个成本回收方法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一是提高所有在校生的学费;二是通过增加高收费的国际学生或外州学生来改变学生结构;三是招收自费生,让那些达不到入学考试成绩的学生注册为“非正规”学生,并向他们收取远高于“普通”学生的学费,数额经常等于或超过单个学生的全部教育费用。招收自费生的现象在东欧和亚洲许多国家都非常普遍。

通过确保生均资源的充分来维持或提高质量,这是所有费用上涨的主要目的。然而,收取更高的学费并同时扩大招生,就可以增加入学机会。另一方面,如果提高学费而保持入学率不变,那么结果就是入学机会受到限制。提高学费也可能会成为阻止学生入学的更为温和的手段,除非在提高学费的同时也提高对学生的资助数额。

减少生均资源支出

要解决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有限公共资源之间的冲突问题,另一个常用策略是减少生均资源支出。院校常用的一种策略是削减专业和削减员工,或找到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进行教学活动并提高运作效率。促进保证更大效率的方法通常包括减少招生以缩小学校规模,这样一来,就可以为录取的学生提

供充足的资源。减少生均资源的另一途径是减少入学人数。政府可以通过提供额外的财政援助来刺激教育需求或者通过设置招生数量底线等方法来鼓励扩招,以使招收的学生数量可以超过政府资助的范围。

世界各地都在用不同的方法提高效率。许多国家、州或省的大学通过削减专业和员工来应对政府经费紧缩的局面——这通常也是应对公共经费减少的首要措施。在很多情况下,国家对入学人数设置了上限,同时增加财政补助以使更多学生受惠,从而保证生均资源充足并减少未来的预算负担。新西兰和英国是两个制定入学人数上限的突出例子,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为院校带来更多的公众支持,而是因为学生贷款补贴将会由此上升。

许多国家允许院校增加招生人数——招生人数甚至超出政府资助的水平,但并不为这些额外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政府资金。经济理论认为,只要这些院校收取的学费相当于或大于这些额外学生产生的边际成本,就应该增加学校的入学人数。

这些方法对质量和入学机会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削减成本和削减专业的努力是为了提高效率,却通常造成质量的降低;然而,控制入学人数会减少入学机会,却可以提高质量,因为这样可以使更多的资源流向更少的学生。另一方面,提供更多的学生资助或设置招生人数底线可能会增加入学机会,但是也很可能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因为现有资源将被分配给更多的学生。

如果院校从额外录取的学生那里收费,扩招所造成的对质量的负面影响将部分或全部被这些额外的资源所抵消。类似的,如果简单地通过增加课程规模和生师比来进行扩招,质量可能受损。但是,如果原本较低的

教学量增加了,或原本招生人数少的专业要扩招,则可能不会对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甚至还可能提高质量。

扩张私立院校

要在困难时期满足需求,第三个策略是允许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于是,一些政府决定,如果公立院校扩招无法满足需求,那就鼓励私立院校的发展,以应对飙升的需求。这种鼓励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放松监管环境、允许政府资助范围覆盖私立院校的学生。代金券或学生贷款亦是可用的方法。

亚洲地区也许是最青睐第三条策略的地区。在韩国、日本和印尼,私立院校招收了一半以上的适龄学生,亚洲许多其他国家也有大量就读私立院校的学生。中东和南美洲是另外两个大力发展私立高等教育的地区。

这种重视私立院校的做法显然是为了在不增加公共资源的条件下扩大入学机会,以满足需求。但是,这也造成了一些重要的质量问题,因为私立院校的质量通常低于拥有充足资金的公立院校。然而,美国是一个明显的反例,因为美国的私立院校往往比公立院校拥有更多的经费。当营利性院校成为私立院校主流时,质量就成为一个更令人担忧的问题,因为这些学校经常专注于吸引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能力不足以完成大学教育的学生。解决这一质量问题的做法之一是确保有一个强大的质量保障系统可用,以防止低质量院校的出现或长期存在。

总之,在解决用有限的公共资源满足日增的需求问题时,各国可以考虑以上方法。在质量和入学机会上,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很大程度上要视每个国家的历史和具体情况而定。

柬埔寨高等教育：次级学位？

David Ford

柬埔寨皇家金边大学（at the Royal University of Phnom Penh）化学系讲师

电子邮箱：ford.david@rupp.edu.kh

过去十年，柬埔寨的经济以7%的增长率快速发展。同一时期，高等教育增长了超过10倍。现在，柬埔寨有91所高等院校，其中68所大学和23所学院，其中59%是私立大学，在校生约20万。随着很多新院校和现有院校的分校在省会城市纷纷建立，入学机会大大改善。

挑战

尽管宏观经济情况相对较好，教育、青年和运动部（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Youth and Sport）也被立为优先部门，但这个部门也是唯一一个在过去五年中财政预算份额每年连续下降的部门。高等教育占国家预算的比例较小（低于1%），高等教育入学率在该地区也为最低（约5%）。所以，高等教育部门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公立高校中的教师们仍然只能领取一份维持生计的薪水（每月约120美元的基本工资），这强迫他们去私立学校寻找工作。私立和公立院校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低于10%。事实上，政府并没有为科学研究安排财政经费，所以极少的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几乎所有大学都是以捐赠者为导向、由捐赠者资助的。事实上，政府也没有留学奖学金政策。即使是所谓的在本土高校就读的奖学金也只是在公立高校免学费而已，不包括生活津贴。高中毕业生中的奖学金分配比例也在不断降低。

最近来自主要捐赠者（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等）的报告都指出，不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不论是内部

还是外部，高等教育呈现低效率发展趋势。尽管入学率低，一些地区仍然出现能力不足的毕业生过剩的情况，而在一些人才需求较高的地区却出现技能供给不足。约60%的学生学习商学、社会科学、法学，不足25%的学生学习建筑学、教育学、医疗卫生、工学和硬科学。如果东南亚国家联盟到2015年成为经济共同体的愿景得以实现，柬埔寨大量毕业生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问题将引起什么社会后果？柬埔寨怎样才能在地地区竞争呢？

体制问题背后的原因

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的脱节并不是新问题。第一所私立大学开学至今已经15年了，这期间柬埔寨的高等教育快速扩张和商业化，学生数量已经从1997年的约1万人增加到现在的约20万人。然而，过去十年，管理机制、大学注册法令和柬埔寨认证委员会在应对新情况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进步。可能人们是期望市场的力量可以自动改善质量，但是到目前为止，竞争只导致冲向底线的竞赛，学校通过降低学费、提供折扣和“免费WiFi”等形式进行竞争。

缺乏规制造成高校林立，但是许多所谓的注册大学显然不能满足成为大学的技术要求。只有少数院校可以配得上“大学”的名号，其中有几所学校正在不断提高办学质量。然而，在一些其他的学校，没有教师拥有获得认可的研究生学位，却有办博士教育的许可。尽管建立高校需要满足的资质法令从2002年就付诸实施，但是仍有许多大学缺乏

合格的教师教学生，却还在拼命为学校课程做广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可能与高等教育高度政治化的特点有关：政治上有权有势的特权阶层不受国家法规的管束。

无效法规的后果

尽管阐明了原因，但类似经济危机的情况正在出现。持有无价值学位的大学毕业生正在形成“泡沫”。激烈的竞争让有风险的却具吸引力的教育产品在国内教育市场上出现，然而现实问题是：能否负担学费，这比学术能力更重要。结果，许多院校正在提供“次级”学位，由于各种因素——包括选拔的学生能力差、教学的教师不合格、评估标准低、腐败等，这些学位几乎没有任何实际价值。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教育产品包括提供给那些没能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学生就读的副学士学位项目和没有实验室及试验要求的科学课程。获得的学位更像是顺从于体制和一种庇护关系，而不是知识和技能的象征，学位更正确的叫法应该是收据。

当持有次级学位的毕业生尝试用学位去找工作但是遭到拒绝会发生什么呢？许多学生已经为无价值的学位投入了大量金钱，如果不能通过工作赢回投资的话，可能会感到不满。一些大学已经破产了，大学毕业生中广泛蔓延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现象已经被媒体报道出来。他们的不满什么时候、会以怎样的形式爆发出来还有待观察，但是其他国家却并不少前车之鉴，学生的不满最后导致社会动乱等。显然，政府对此漠不关心，这可能是政府不提供任何失业津贴，也可能是因为2006年建立的新征兵制度，虽然还未实施，但是最终可能可以用来解决这些矛

盾。另一方面，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谁会承受最终后果？肯定不会是学校的拥有者和立法者。

结论

由于缺乏有关高校的独立公开的信息，欲申请入学的学生不能在知情的情况下作选择，这为质量改进带来一些压力。许多大学拒绝为学生提供教师信息，更令人惊讶的是，极少有学生就这一点提出质疑。结果，由于没有掌握学校准确的公开信息，且对市场需求和教育质量又缺乏认识，许多学生依赖于道听途说选课，这样选的课程并不适合自己，质量也不高。

因此，尽管柬埔寨政府已经将教育立为优先部门，高等教育却显然不是。原因可能与另一个体制问题有关：正如最新的报告提到的，问题在过去，如教学方法跟不上时代，不能激发学生思索和分析。一个越来越专制、对不同意见敏感政府可能并不情愿鼓励一个促进批判思维的体制，对维持现状的兴趣更大。

越来越多的年轻毕业生相继回国，他们都受到外国奖学金资助，也体验过更有效的体制和不同的学习模式，他们为我们带来了一丝希望。这些毕业生不大可能接受陈旧的管理体制，更可能应用新的教学方法。一些人应聘了柬埔寨认证委员会（the Accreditation Committee of Cambodia）的工作，已经成功评估了大学基础课程，并即将开始进行院校评估。随着这些年轻的高素质学者不断发展并不断晋升、获得影响力，顶层的保守势力逐渐退休，柬埔寨的高等教育可能会逐渐得到改善。

尼泊尔高等教育：公立与私立的较量

Bala Raju Nikku

尼泊尔社会工作学院 (the Nepal School of Social Work) 创院主任, 现任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的社会科学学院访问讲师

电子邮箱: nikku21@yahoo.com

作为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的尼泊尔 (人口约三千万人) 正在经历一系列转型, 并且在重新制定宪法。尼泊尔的教育机会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都有限。

在尼泊尔, 新的共和制取代了古老的君主制。如此快速变化的政治氛围也许能促进高等教育在新成立的共和国中取得进一步发展。尼泊尔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很短暂, 但自从 1950 年代建立民主制度以来就一直在发展。特里布汶大学 (Tribhuvan University) 在印度和美国的帮助下成立于 1959 年, 是最古老也是唯一的一所大学 (直到 1992 年)。在特里布汶大学建立之前,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曾仿照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大学 (Patna University) 的必修课开办过一些课程, 建立了其自己的考试制度, 并向成功完成学业的学生授予学位。到 1965 年, 该大学在尼泊尔有 5 个学院, 在校生 5000 人; 还有 51 个社区学院, 在校生人数 10000 人。

建立新大学

直到 1992 年, 加德满都大学 (Kathmandu University) 才在一项议会法案下以公私合营的形式建立起来。该校的建立为私立高等院校在该国的扩张铺平了道路。到目前为止, 尼泊尔只有 5 所大学, 它们要为三千万人口提供高等教育。这些大学是特里布汶大学 (Tribhuvan University)、尼泊尔梵文大学

(Nepal Sanskrit University, 作为一个高等教育皇家委员会的一部分创建于 1980 年代)、加德满都大学 (Kathmandu University, 创建于 1992 年)、位于东部地区的普尔班桥大学 (Purbanchal University, 创建于 1994 年) 和位于西部地区的博克拉大学 (Pokhara University, 创建于 1997 年)。1992 年, 在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建议下, 这些院校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作为地方性大学成立。还有另外两所地方性大学正在建设中。蓝毗尼大学 (Lumbini University) 刚刚启动, 两个自治的医学研究所——柯伊拉腊 BP 健康科学研究所 (BP Koirala Institute of Health Sciences) 与国家医学科学院 (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也尤为成功。

入学机会：挑战和机遇

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从 1971 年的 1.7 万人增加到 2001 年的 103290 人, 2005/06 学年约增至 254856 人。2005/06 学年, 特里布汶大学在校生有 153116 名。这些数字显示, 高等教育存在着巨大的需求 (市场)。然而, 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和质量、合格的人力资源和研究能力都已成为核心问题。尽管有国际双边捐赠机构的支持, 但是高等教育的政治化、10 年国内冲突 (1996—2006) 以及疲软的治理机制都进一步迫害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尼泊尔高等教育 60 年的发展历程并不乐观。作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虽然人口比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都多），却也在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做出了贡献。加德满都山谷有超过 200 个教育咨询公司，它们在努力帮助那些能支付大学费用的学生，每年把他们送往国外求学。尼泊尔也吸引了来自印度的教育投资，建立提供医学教育的机构。其目的是吸引来自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外国学生，因为他们能够为此支付高额费用并提供巨额捐款。例如，印度私立教育集团曼尼帕尔教育和医疗集团（the Manipal Education and Medical Group）已经在尼泊尔建立了一所医学和牙科学院。大多数就读于印度大学的国际学生也来自于尼泊尔，这是因为支付能力、质量、信誉、地理邻近性以及印度政府提供的奖学金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高等教育私有化

尼泊尔的私立高等教育在过去的 20 年里获得了长足发展，超过了公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势头。举一个例子，加德满都大学就是一所私立大学，它获得了政府的大笔资助。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对加德满都大学的生均资助超过了对特里布汶大学附属的公立学院的资助。因此，公立院校能够迎合贫困学生的需求，私立院校则面向中产阶级和富裕阶级的学生。虽然高等教育入学率增加了，偏见、边缘化、社会排斥和执法不公等仍影响着尼泊尔的社会构成。因此，国家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让高质量、可负担得起的高等教育为所有公民提供更多没有阶层、信仰、种姓、地理、宗教歧视的入学机会。

未来之路

政策制定者需要讨论尼泊尔如何可以受益于全球化并为之出一份力——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21 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宣言”（UNESCO's World Declar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该宣言在体制和院校的层面提供了一个国际框架。政治家、政策制定者、大学官员、市场力量和学生是如何理解和实践高等教育的真正意义，以使其与社会需求及职场联系得更紧密的呢？

2008 年，尼泊尔宣布成立联邦共和国。目前，宪法正在重新制定中，尼泊尔希望和平、繁荣、平等和公正。这个过程是尼泊尔促进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另一个机遇。到目前为止，高等教育相关政策只是将大学视为培养学生成为“党派政治”人物的实验室，并利用大学来满足政党和领导人的野心和利益。如果这种情况继续，那么尼泊尔共和国将不幸与过去的政权一样，即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仍将由相关统治阶层所占据。

此外，目前迫切需要解决尼泊尔社会的政治、生态、社会和知识需求问题，它也正经历一系列转型和重组。尼泊尔学者应该承担起重要作用，为决定公立、私立高校知识传授形式游说的宪法权利而游说。这是学术界的直接责任，不能留给变幻莫测的尼泊尔政客来完成。政客们认为高等教育对政府来说总是昂贵的支出，因此家庭需要“投资”，学生应该“购买”。尼泊尔具有丰富的历史和自然资源，正面临着把国家变成世界一流学习中心的机遇。国家缺乏的不是资源，而是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治理高等教育。要想与瞬息万变的社会和世界保持关联，尼泊尔还有很多迫切问题有待解决。

那烂陀大学终极版：印度比哈尔乡村有可能发展世界一流大学吗？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在东亚峰会 (the East Asian Summit) 的支持下，印度和比哈尔邦政府正在比哈尔邦的北部农村靠近那烂陀大学 (Nalanda University) 原址的地方，重建这所已经有 600 年历史的那烂陀大学。该项目拨付了大量资金，重建计划也正在进行中，该校也已建立了良好的国际关系。为印度的这个真正的文化知识宝藏穿上现代装束——这个概念当然是美好的。该大学重建计划专注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生态学和商业研究，而不是通常的重视工程和技术学科。但学校建设过程中还需要考虑一些严肃的实践和概念问题。

地理位置

学术机构的地理位置是至关重要的。那烂陀国际大学想要吸引印度和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地理位置是极其关键的。一流的生源和师资会被吸引到比哈尔乡村吗？可能这并不能如愿以偿。最优秀的人才希望处于知识、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中心。学者们希望能够轻松结识同行，他们也重视是否能方便得出行。互联网可以促进学术交流，但根本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一流学者还重视设施，好的设施不仅包括图书馆和实验室，还包括艺术博物馆，甚至还包括餐馆和咖啡馆。

最近几十年，印度和其他地方的经验表明，很难在远离中心的地区建立顶级院校。印度理工学院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最初建立的一些分校临近城市中心，但也并不位于城市中心。在这些地方，不仅有空间构建一个校园，离学术界和都市中心也较近。一些新的重点大学以及印度理工学院的新校区都远离城市和社区，很难吸引最优秀的教师和学生。

最近，也有一些全新的学术机构拔地而起。毫无疑问，其中最昂贵的莫过于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达附近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 (the King Abdull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该校毗邻一个大城市，拥有数十亿美元的捐赠，并结交了海外顶尖大学，不过它是否成功还不确定。把最好的学者吸引到沙特阿拉伯并不容易。重要的是，阿卜杜拉国王在建立了大学之后，让大学保持了相对于沙特政府的独立性，拥有自己的预算和捐赠。国王并不希望新大学陷入政府官僚主义的泥潭。这所大学对印度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另一方面，韩国浦项科技大学 (the Poh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虽位于韩国的一个省级城市，却也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功。学校只有 20 年历史，却已经在全球排名中名列前茅。它是一所私立大学，有浦项钢铁公司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几十年前，日本政府在远离日本大陆的冲绳岛建立了一所科技大学，投资巨大。许多人都声称这所学校是一个成功，但究竟是不是如

此还尚无定论。

一些顶尖的美国公立大学案例也可作为参考。其中,大多数顶尖大学成立于19世纪,位于或靠近都市中心,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靠近旧金山,密西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则临近底特律;但是,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却在一片玉米地中——这是一所著名大学,但却不像伯克利或密西根大学那么卓越——在竞争一流教师上也并不那么顺利。

作为“发展项目”的大学

很多国家的政府在决定新大学地理位置时会考虑许多因素。有些区域的学生可能没有便于学习的好地方,有些特定的地区可能需要投资或发展,也有些地区的政客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力。高等教育机构的选址常常有充分的理由:机构可以对当地经济增长、学生入学或其他重要的社会目标做贡献。印度经常利用这种策略取得成功。

然而,试图让一所顶级研究型大学的选址迎合发展目标则是误入歧途。学校的建设初期需要巨额投入,但成功的机会却有限的。事实是,一所研究型大学的需求与一所教学

型大学的需求是不同的。

新那烂陀大学位于学校原址,其选址不是由大学具体的发展目标决定的。但是,这样做的部分动机很可能是将资源和现代化引入比哈尔邦——当地甚至在谈论改变机场的位置。

会起作用吗?

新那烂陀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所面临的挑战令人生畏。如上所述,地理位置不佳甚至可能成为一个决定因素。即使有外国资助者和中央政府的帮助,钱仍然可能是一个问题——一流大学的建设非常昂贵,特别是在农村和不发达地区。开发初期的经费问题很重要,财政支持的水平必须有延续性才能成功。那烂陀国际大学作为一所计划强调发展生态、发展、和平研究以及类似“软学科”的大学,将很难在全球排名中获得认可,因为很大程度上,自然科学是排名的依据。最好的策略是忘记排名,但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许多中央与地方政府机构的介入都有可能引发瓶颈问题和官僚主义——这些问题似乎也常常困扰着印度和其他地方的高校。

也许最好的对策是保留那烂陀大学的名称和精神,但把大学搬到一个更实际的位置。

卢旺达的高等教育发展

Rebecca Schendel、Jolly Mazimhaka、Chika Ezeanya

Rebecca Schendel: 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博士生

电子邮箱: rebecca.schendel@gmail.com

Jolly Mazimhaka: 卢旺达基加利科技学院 (the Kigali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质量保障部门主任

电子邮箱: jolly.mazimhaka@gmail.com

Chika Ezeanya: 卢旺达金融学院 (the School of Finance and Banking) 研究主任, 电子邮箱: cezeanya@sfb.ac.rw

也许卢旺达政府比非洲任何其它国家的政府都更加专注高等教育, 将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之一。面对优先初等教育的捐赠压力, 卢旺达强调高等教育的重要性, 并将其视为发展的催化剂。卢旺达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独特的案例, 规模小、位于内陆、刚刚经历了悲剧性的历史。然而, 卢旺达的经验对分析国家构建高等教育能力、刺激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潜力和挑战提供了洞见。

2000 年, 卢旺达政府发布了国家发展战略蓝皮书, 即《2020 愿景》(Vision 2020)。规划指出, 首先要开发卢旺达的人才能力, 将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知识经济国家, 能够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规划阐述了国家对信息技术、工程和管理等学科的技术人才的需求。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 卢旺达的高等教育预算比例几乎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其他任何国家都高。这一前所未有的高等教育财政支持已经使高等教育在招生数量和学校数量上快速扩张, 年增长率约 13%。高等教育已经成为该国扩张最迅速的部门。

生机勃勃的环境为卢旺达高等教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展示了大学在国家发展

中能够发挥的关键作用。然而, 只有当卢旺达的大学能够给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体验时, 政府的愿景才能实现。本文将概述卢旺达高等教育近期取得的一些成功表现, 并探讨高等教育质量所面临的、阻碍教育发展的一些重大挑战。尽管卢旺达有一个巨大的私立高等教育市场, 但绝大多数政府资助仍然流向了公立大学。

卢旺达高等教育简述

目前, 卢旺达高等教育系统共有 29 所院校 (17 所公立、12 所私立大学)。高等教育委员会 (the Higher Education Council) 是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 成立于 2007 年, 隶属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委员会成立以来, 高等教育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新大学不断建立, 大学的招生政策、教学课程结构和学生资助计划都发生了变化。

巨大成功

在过去的 10 年里, 卢旺达的高等教育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其中, 最主要的是高等教育行业的快速增长。2011 年, 卢旺达的大学在校生达 73674 名。尽管

适龄人口入学率仍然只有2%，但是入学人数近年来却呈指数增加。1995年以来，在校生成人数年平均增长率为20~25%。

同时，卢旺达的大学也改进了课程设置和基础设施。高等教育委员会也通过建立国家认证和审核政策使卢旺达的院校认证制度化。

严峻挑战

尽管卢旺达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但其大学仍然面临障碍，其中许多都对大学教育质量产生了重大影响。

尽管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相比，公立大学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政府资金，但是卢旺达的大学仍然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在2010年国家决定减少25%的大学资助转而投向职业培训的情况下。由于大学预算削减，大学现在要另谋收入维持运营。大多数学校选择增加学费，招收更多自费生或建立咨询公司的方式。

大学也缺乏忠诚的教师。不断增加的私立大学数量也增加了对教师岗位的要求。由于学者的供给并没能以同样的速度增加，因此，对教师需求的增加则导致了更多教师倾向于在多所机构中兼职。除了兼职教学，一些教师也为国际组织提供咨询服务，以此来弥补教师薪水的缺口。教师的超负荷工作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公立大学的教育质量，同时降低了增加研究产出和研究生课程的可能性。

此外，卢旺达的大学还需要应对国家教学语言的巨变。由于殖民历史，从独立到20世纪90年代，卢旺达的学校一直都使用法语教学。1996年，卢旺达引入了一个双语教育

系统，要求大学提供法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的教学。2008年，卢旺达政府宣布，出于效率的考虑，到2010年，英语将成为该国所有教育层次唯一的教学语言。大学在校生现在完全用英语学习。虽然由于该决定对毕业生就业前景有好处，许多学校都支持教学语言的变化；但是教学语言的变化却对大学在校生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大多数大学在校生在小学和中学时都用法语学习，所以许多学生对用英语上课、阅读感到非常吃力，这引发了人们对其理解和掌握教学信息情况的担忧。

此外，虽然卢旺达已经连续15年支持其高等教育的发展，但学生们似乎并不具备劳动力市场所需的技能。最近高等教育委员会发布的国家人才调查指出，毕业生缺乏沟通能力、技术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关键素质。尽管增加学生的入学机会取得了积极进展，如果大学不能培养大学生具备进入劳动力市场所需的相关能力，那么大学教育的价值仍将受到怀疑。

未来发展

政府正在努力通过提高研究设施和信息技术效率与投资来解决大学面临的大量基础设施和财政问题。然而，许多改革并不能提高卢旺达公立大学的学术质量。相反，必须增加对学生学习问题的关注——特别是有关卢旺达独特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形势的学习，才能真正振兴高等教育。

卢旺达的大学已经获得了很多投资，许多教育产出也令人满意。如今，卢旺达大学的紧要需求是要找到显著改善学生学习体验的方法，以帮助国家在未来发展中储备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技术人才。

非洲学生在印度的流动模式

P. J. Lavakare、K. B. Powar

P. J. Lavakare: 印度莫迪理工学院 (the Mod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曾任位于印度的美国教育基金会 (the United States Education Foundation) 执行主任

电子邮箱: lavakare@vsnl.com

K. B. Powar: 印度帕蒂尔大学 (D. Y. Patil University) 校长助理, 曾是印度大学委员会 (the Association of Indian Universities) 的秘书长

电子邮箱: kbpowar@gmail.com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 印度和非洲都引入了英国高等教育体制; 即使印度和非洲的大多数国家已经是独立国家, 但这一教育遗产的影响仍持续至今。1947年印度独立后, 教育基础设施不断改善, 开始吸引非洲学生前来接受高等教育。但近年来, 非洲学生的数量却急剧下降, 这在印度引发担忧。人们有必要了解造成这种下降趋势的原因, 并设计扭转趋势的方法。本文只把在印度学习和生活的学生作为国际学生, 而并不考虑注册远程教育的学生, 因为人们认为真正的国际教育体验只有通过跨境教育才能获得。

大起大落

1990/91 学年, 印度共有 6222 名非洲学生, 他们来自 35 个非洲国家, 分散在近 100 所教育机构中。同时, 印度有约 12900 名国际学生。因此, 非洲学生占国际学生总数的近 48%, 这表明印度是非洲学生首选的求学地。另一半国际学生主要来自亚洲和中东。少量的其他学生来自发达国家, 目的是在印度获得更短期的国际教育体验。如今情况不同了, 亚洲学生比非洲学生的人数多 4 倍。来自发达国家的学生人数仍然很少。

这些年来, 非洲学生的数量稳步下降,

2009/10 学年只有 2700 人。非洲学生现在只占国际学生总人数的 15%, 跌幅显著。尤其是考虑到印度作为一个英联邦国家, 和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有类似的高等教育体制发展, 印度本应该吸引更多的非洲学生。同时, 印度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 学习和生活成本也更低。有必要指出, 在印度, 外国学生不被视为收入来源。与发达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 (Anglo-Saxon countries) 不同, 印度政府并不收集和发布关于收入或其他可以从国际学生那里所获好处的统计数据。

远程教育计划

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国家开放大学 (the Indira Gandhi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是世界最大的远程高等教育机构。该学院雄心勃勃, 计划着为非洲和西亚学生提供跨境教育。英迪拉·甘地国家开放大学这一“泛非在线网络” (the Pan-African e-network) 于 2008 年开始运作, 与 16 个非洲国家签署了理解备忘录, 采用一个双向通信的电话会议机制开展教学, 两端分别是非洲学生和英迪拉·甘地国家开放大学工作室。课程覆盖研究生、本科、毕业证书、证书各层次。2008/09 学年, 超过 2000 名的非洲学生注册了课程;

2009/10 学年, 有超过 3000 名学生注册。然而, 最近尼日利亚发布的信息表明, 2008/09 学年, 每 49 名被录取的学生中, 许多都会辍学, 只有 24 人能成功完成学业。由于完成率低, 该项目可用的外部经费已经被中止。

虽然远程教育是一种有用的教育模式, 但是它不需要学生真正地跨越国界, 也不体现国际教育的真正精神。因此, 流入印度的非洲学生数量下滑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非洲英迪拉·甘地国家开放大学远程教育的成功。然而, 人们需要评估其他可能导致数量下滑的原因。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2008/09 学年在印度的国际学生中, 大约 27% 就学于远程教育。而非洲学生中, 相应比例则高达 45%。比起英迪拉·甘地国家开放大学将近 400 万的注册学生, 这些数字可能看起来不高。然而, 远程教育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问题, 其中学生流动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其他可能的原因

印度的院校在世界前 500 大学的排名中表现不佳。因此, 国际学生并不确定印度提供的教育是否能帮助他们在全球市场参与工作竞争。此外, 随着非洲的经济发展, 他们的高等教育支付能力和意愿已经增强; 虽然印度的教育和生活成本低廉, 但选择在发达国家学习已成为首选。

在印度的大学中, 国际学生的入学程序非常繁琐, 签证和文档验证过程很耗时。这对学生是一种威慑, 而学生在世界上还有更广泛的选择。印度被认为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国家, 客人们受到尊重。然而, 由于种族和肤色的原因, 非洲学生发现自己很难被印度社会接受, 这是印度应该关注的问题。

在外界的帮助下, 非洲联盟 (the African

Union) 的建立以及非洲联盟在非洲各国建立泛非大学的新行动等, 也促进了非洲学生留在非洲大陆学习, 并且让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具有国际特色。

印度还没有努力拓展其海外教育市场。其他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 如中国, 已经在开展营销并发展国际合作关系, 这些举措都吸引了非洲学生, 使其不再依赖印度的学校。

新行计划?

在非洲学生人数下降的背景下, 印度政府需要执行一个策略, 通过印度高等教育体制和政府教育系统的共同努力来提高并加强与非洲的合作。

印非首脑会议应该将“高等教育交流”作为主要合作议程的一部分; 印非双方的大学都应参与这个政治论坛。论坛需要通过建立一个印非大学网络 (India-Africa University Network), 鼓励印度和非洲几百所大学的合作。女性高等教育是印度和非洲的一个共同议程。在非洲建立一个印非女子大学 (Indo-African Women's University) 可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计划。

印度和非洲的大学应该开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经验分享讨论。非洲联盟已经组织了三届此类会议, 印度也应参加。针对印非高等教育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应该定期召开联合会议。印度和非洲都特别需要高等教育、医学教育、技术管理教育和法律研究领域的人才发展和职业培训。应该通过各种公立和私立合作模式, 鼓励印非院校之间的合作。

印度有超过 50 所企业在非洲经营。这些企业可以通过赞助奖学金、提供实习机会, 来支持教育交流。他们可以帮助非洲学生留学印度, 学生完成学业后可以帮助这些公司

在东道国运营。

结语

在印度求学的非洲学生人数的下降值得引起注意，因为印度正在失去其传统教育伙伴。也许，印度已经将与非洲的关系视为理

所当然，但其他国家也在向非洲示好。印度需要吸引国际学生，以此为国内学生提供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交流的机会。印度现在是时候发展一些新举措，建立新的教育外交政策了。

西巴尔干半岛高等教育问题分析

Paul Temple

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高等教育管理教授,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任,

电子邮箱: p.temple@ioe.ac.uk

在2012年《国际高等教育》第68期中, 阿特巴赫 (Phil G. Altbach) 和乌瓦利克-涂比克 (Stamenka Uvalic-Trumbic) 分别就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和塞尔维亚这两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写了文章, 阿加齐 (Paul Serban Agachi) 还回顾了巴尔干地区另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 巴尔干地区的高等教育系统拥有毋庸置疑的优势, 正在努力克服共产主义统治时期遗留的功能失调问题, 但仍然受制于这些问题。

这些支离破碎的地区现在被称为西巴尔干半岛, 包括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顿、黑山和塞尔维亚, 对这些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是有价值的。阿尔巴尼亚是一个特例, 它不属于南斯拉夫, 曾受恩维尔·霍查 (Enver Hoxha) 的独裁统治 (1945~1985年)——这个政权无可争议地被称为“疯子政权”。这些国家都在南斯拉夫暴力解体 (1991~1995年) 的余烬中苦苦挣扎。它们都在试图用稀缺的自然资源和通信设施建立适用于小国的经济体制。一些国家内部存在种族分歧和未解决的冲突, 这加剧了其他困难。这些国家正在寻求加入欧盟, 但在各种问题面前 (包括低效的政治结构、不可靠的法律程序、虚弱的经济、腐败成风等问题), 要实现这个愿景似乎还很遥远。所以, 这些小国的现状反映了欧洲当今存在的

最棘手的重建与发展问题。

小国家, 大问题

不出所料, 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存在各种困难。虽然长期缺乏资源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 但相比于结构破碎、组织僵化、知识隔离、腐败盛行以及阿加齐探讨罗马尼亚问题时所提及的“伪造价值”、“缺乏主动性”等问题, 资源问题可能还更容易对付。阿特巴赫指出的加强内部领导、可持续的资金、差异化的使命和选择度以及国际化等问题是斯洛文尼亚高等教育改革的优先事项。这些问题也存在于西巴尔干半岛的其它国家。

此外, 西巴尔干半岛的高等教育体制还有一些显著特征。也许, 规模小是这些高等教育体制最大的问题。黑山的人口有60万, 却只有一所公立大学。马其顿的人口有200万, 只有两所重点公立大学和一所声名卓著的私立非营利性大学。即使部门和机构的管理很有效, 仍然很难判断在这些情况下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可能性。困难并不在于院校的数量或大小, 尽管一些大学确实太大了。然而, 正如阿尔特巴赫指出的, 没有国际惯例的小体制容易走向偏狭。

即使一些国家从规模上说并不小, 但民族矛盾导致内部分化。比如, 在拥有450万

人口的马其顿特别是波黑地区还存在 14 个教育部门——虽然不是所有教育部都掌管高等教育。波士尼亚与克罗地亚主导的波黑联邦和塞尔维亚主导的塞族共和国之间的内部分歧成为国家重组计划的障碍；在联邦内部，民族族群紧张还导致两所大学同时伫立于莫斯塔这个小城，一所归克罗地亚，一所依赖于波士尼亚。在这里，大学被视为政治意图的象征。高等教育正被用于彰显该地区的权力分配，并用来回馈当地政客的支持者，以此帮助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分裂计划的实施。

碎片社会中的碎片大学

碎片化（fragmentation）也是该地区大学内部组织的一个特征。这一特征起源于南斯拉夫传统中强大的师资和管理体制。建立新的管理阶层导致体制扩张和组织臃肿，难以进行机构重组。尽管目前到处都在尝试整合教师队伍，建设更强的、统一的大学，这种内部冲突仍然继续存在——由于各种权威相互竞争，因此制度变革难以取得成功。大学难以确立正式的、有特点的使命。这些大学中的制度分裂难免被视为国家和区域层面碎片化的反映，尽管这样做的正当性还未得到历史证明。

在乌瓦利克一涂比克的文章中，她认为学术腐败是塞尔维亚的大学存在的关键问题。同时，这个问题也是该地区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显然削弱了西方大学对该地区学术标准的信任。比如，仍然在广泛实施的一对一口语考试是导致学术腐败的一个因素，但只改革考试程序（例如，塞尔维亚将口试改成笔试或者新的质量保障

程序）不太可能解决这个根深蒂固的问题。

（在 2006 年底《国际高等教育》第 42 期上，我曾经描述过格鲁吉亚的相关尝试）。

乌瓦利克一涂比克还指出，塞尔维亚声称正在实施的博洛尼亚改革可能“只是表面上的”改革。这也是我们对该地区的评价，博洛尼亚进程对该地区的实践影响甚微。例如，在一些情况下授予的“3+1”或“3+2”的学位（在博洛尼亚术语中指的是本硕连读学位）被用于维护传统的四年制或五年制本科学位，传统的学位体制受到教授阶层的支持，却不具有博洛尼亚框架旨在获得的效率。这个例子似乎表现出该高等教育体制的另一个内在特质，颠覆了对外宣称的“现代化”和“欧洲标准”（European standards）的政策导向。我们很容易得到这样的结论：政策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距延续了共产党管理时代的问题，在那个时代，意识形态论调常被用来掩盖真正的实践。

结语

本文引用了开放社会基金会（the Open Society Foundation）资助的研究结果。乌瓦利克一涂比克指出，塞尔维亚大学的一个前进方向是“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发展博士联合培养项目、创建区域性学科网络等，这些措施可能成为一个减少大学数量、提高质量并加强专业相关性的机制”。我们为“开放社会基金会”所开展的研究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我们建议支持该地区不同类大学与一个或几个国际合作者之间开展小规模的研究合作。我们建议，在考虑研究课题时，地区合作伙伴对研究课题有兴趣并具备基本的开展研究的能力，这些因素比研究题目本身还要重要。

这样可以鼓励教师之间、大学之间、地区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协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碎片化的问题。它还可以为学科知识、教学方法和研究方法上的专家交流提供所需的环境。

认为有限的大学改革可以解决该地区高

度分化的社会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这是极端天真的。然而，通过证明该地区的合作活动可以产生积极成果，也许会带来更多的好处。也就是说，改革更有可能是从大学向外溢出的，而不是从功能失调的政治结构向下渗透的。

日本的大学应该改变大学学年安排吗？

Yukiko Shimmi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研究助理

电子邮箱: yshimmi@gmail.com

大学国际化的努力常常与国内体制相冲突，日本大学目前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在日本，为了促进大学的国际化，2012年5月东京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内部小组建议将新学期从每年4月开始变成从9月或10月开始，以期将学年安排与世界标准接轨。尽管这个建议仍在讨论中，日本的主要大学、日本政府和工业界已经开始讨论实施该学年安排变化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障碍。虽然这个建议可能成为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改革的一个潜在的象征，它却从不同方面突显了传统与国内制度间的冲突。东京大学和其他日本大学要改变学年安排仍然面临困难。

原因和概念

东京大学的内部小组建议大学应该在五年内改变学年安排，将秋季 (9月或10月) 作为学年的开始，以加快日本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根据报道，世界上70%的国家将9月或10月作为新学年的开始 (不仅包括西方国家，还有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台湾等)，而大多数日本大学却都在每年4月开始新学年。一些日本大学已经开始在秋季招生，但这不是常态。因此，将学年安排与世界标准接轨将有助于促进学生和学者的国际交流，并增加大学之间的研究合作。采用新的学年安排后，学生可以参与一学期或一年的海外项目，而不会与课程安排相冲突或

延迟毕业。当教授和研究人员希望作为访问学者开展研究或到国外任教时，教学或行政责任限制会更少。

改变学年安排可以有效地利用暑假。目前的学年安排阻碍了学生在夏天全身心从事其他活动，如参与交流项目、志愿活动和实习任务等，特别是对那些希望游学国外的学生。此外，改变学年安排还会在高中毕业和大学入学之间留出一个潜在的“空档期” (gap term，通常为六个月)。“空档期”的益处包括能让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出国留学和其他有价值的活动，来拓宽视野、激发兴趣。

困难和挑战

尽管改变学年安排有潜在的好处，真正实现却还面临几个挑战。这些问题是由于国家和国际体制之间的两难困境引起的。例如，大多数大学的学年安排与日本社会其它领域的时间表不匹配。从学前预备班到大学，日本传统的校历于4月份开始，次年3月份结束。此外，日本的政府和私营企业在4月开始新财年，每年4月招聘一次新员工。同时，主要的认证考试如公务员、医生、护士和律师考证也都假定员工于4月开始工作。许多日本人喜欢目前的周期安排，高中毕业、大学毕业和开始工作之间没有空档期。此外，中小学和大学的第一年以及年度樱花季节在日本也有重大的文化意义。

另一个担忧是，如果只有一些大学改变学年安排，局势会进一步复杂化。与东京大学和其他一些以促进国际竞争力为目标的院校不同，大多数日本院校为日本国内的学生服务，因此没有任何动力去改变学年安排。同时，正在考虑改变学年安排的几所主要的大学的确遇到一些针对实施方案的反对意见。例如，早稻田大学（Waseda University）这所顶尖的私立大学找到了一个独特的解决方案，在校历中引入一个季度的小学期，以促进大学的国际交流和国际化。

如果只有少数大学改变学年安排，学生、政府、公司和大学可能有疑虑。对那些选择9月份来日本上大学的学生，他们在高中毕业和大学入学之间的空档期仍然不明确。与当前只在4月招聘的刚性体制相比，传统的日本公司应届生招聘需要变得更为灵活，以适应不同的大学毕业日期；否则，一些学生可能会处于劣势。政府和大学之间在财政年度和学年之间的差别也可能会引发预算和财

务分配上的问题。

其它的替代选择

东京大学发表的报告、东京大学校长和公众似乎都一致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不能通过改变学年安排来实现。相反，改变学年安排需要和其他改革同时讨论。因此，为了促进日本学生出国留学，大学可以强调和改善内部支持体系，例如保障海外学习的学分转换、通过语言准备和新生教育促进平稳过渡，以及提供奖学金等措施。然而，为了吸引国际学者和学生到日本去，提高教育质量、克服语言障碍可能比改变学年安排更为重要。虽然改变学年安排可能在推动大学改革中具有象征意义，如果不解决其他潜在的障碍就不能帮助大学发展国际竞争力。无论学年安排是否会改变，东京大学和其他日本大学以及日本社会都极其需要评估当前的形势，并制定日本高等教育未来的战略计划。

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影响高等教育选择：秘鲁的案例

Juan F. Castro、Gustavo Yamada

Juan F. Castro：秘鲁太平洋大学（the Universidad del Pacifico）经济系教师

电子邮箱：Castro_JF@up.edu.pe

Gustavo Yamada：秘鲁太平洋大学经济系教师

电子邮箱：Yamada_GA@up.edu.pe

在发展中国家中，很少有青少年可以在做一些重要人生决定时获得足够的指导，如高中升入大学、毕业后就业等决定。因此，大量的毕业生会后悔他们当初的抉择。大多数高等教育体制过于僵化，会阻碍学生不同课程之间的转换或从职业教育向大学教育的转换。此外，秘鲁缺乏课程专业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同时低质量课程也越来越多，这让原本的问题越发严重。

最近针对秘鲁城市适龄劳动人口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35%的年轻专业人才（22~30岁）对自己的高等教育选择表示满意。这意味着，如果有机会，近三分之二的年轻人会选择另一种职业或另一所学校的（大学或职业技术学院）学位，或在完成中等教育后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

为何有如此多的学生不满意？数据显示：技术学校的大部分毕业生会选择就读大学学位（42%）；很大比例的大学毕业生后悔自己当初选择的大学（该比例在过去的十年中从11%增加到23%）。

造成这些问题的首要因素是秘鲁高等教育的结构性问题，即体系高度碎片化（fragmented）。缺乏综合性意味着：大学毕业生能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同时，虽然职业教育是另一个有效的学位终端，但是这些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要进一步寻求教育机

会，他们就要从头开始接受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些职业会歧视职业教育的毕业生，这使形势更为严峻。

对院校选择的不满反映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另一个常见问题：近一段时间，私立院校迅速扩张，质量却无法保障。

招生人数与教育质量

过去15年，秘鲁经历了私立高等教育供给的繁荣。20世纪80年代，私立大学数量迅速增加（平均每年新建1.7所私立大学）；之后的十年，增长率达到了历史高峰（平均每年3.3所）。与此同时，由于预算限制，公立大学无法应对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就读于私立大学的学生份额现在占学生总数的60%，1996年只占40%。

这一趋势适逢高等教育提供者的重大转变。1996年，秘鲁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882号法令），促进私人投资教育，允许私立大学在经营中享有与私营企业相同的法律待遇。这些激励措施加上来自高收入家庭的教育需求（人均GDP在2000年和2010年之间增长了53%），都激增了私立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在1996年和2010年之间建立的私立院校中，目前有134370名在校生，占这些新院校在校生成总数的17%。

大多数新的私立院校是营利性的，有扩

招的强大动力。因为一旦覆盖了固定运营成本，每个额外的学生几乎完全是利润。招生往往集中在“受欢迎的”专业。由于缺乏职业指导，青少年经常选择这些“受欢迎的”专业，然而对于未来的劳动力市场知之甚少。风险在于，营利性院校会无休止地适应需求，并且不用担心就业情况，除非其受到外部监管。

如果能用毕业生是否获得了成功融入劳动力市场的必要知识来判断高等教育质量，那么公立和私立教育就不存在谁比谁更为有效的说法。但秘鲁缺乏评估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机制，这一机制可能会对创建新高校和学位项目的决策提供依据。

因此，上述的私立教育迅速扩张对大学教育质量产生了三个消极结果。第一是，选择性的下降。平均录取率（录取的学生数量除以申请者的数量）从1996年的30%增加到2009年的45%。在一个小学和中学教育质量都不好的国家（在2009年国际学生评估计划测试中，秘鲁分别排在65个国家中的第63名和第64名），这意味着学生平均基础技能水平的下降。

此外，教师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兼职讲师越来越多，全职教授越来越少。全职教授的比例从1996年的47%下降到2010年的35%。目前，公立大学中全职教授的比例为68%，私立大学只有17%。这一趋势也意味着有关课程和讲座内容分析的研究活动也减少了。

提供的学位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换句话说，新的大学最有可能提供受欢迎的专业，这些专业不需要对基础设施或设备进行投资。工商管理目前是高中毕业生中

最受欢迎的职业选择（占大学在校生总数的15%以上）。不出意料，70%的新建私立大学中都有这个专业，尽管该专业近三分之一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更多的信息、更好的决定

面向不同大学专业毕业生的劳动力市场综合信息，构成了衡量一个社会高等教育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秘鲁缺乏这些数据太久了。也许，当秘鲁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仅限于富裕且消息灵通的精英阶层时，人们就不需要这些信息了。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教育供应的多样化迫切需要就业数据。不幸的是，数据很难收集。秘鲁很少有高校追踪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轨迹。另外，虽然可以依靠税收系统的收入数据，但获得的信息是不完整的且有偏见的，尤其是考虑到秘鲁劳动力市场（三分之二的的所有工作）信息高度不透明的情况。应该进行人口调查来搜集特定学位项目和院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和收入差距的数据。这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准确的信息，同时使得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更透明、高校问责更少。这些公开信息将帮助青少年做出更好的选择，同时刺激高校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成果。随着发展中国家不断巩固其质量保障体系，这类相关数据库可以通过直接从高校搜集专业、教师、基础设施和毕业生就业相关信息来建立。

在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一致性受到很多关注。更好的数据收集和传播是提高高等教育效果的关键措施。

新书速递

Amano, Ikuo. *The Origins of Japanese Credentialism*. Melbourne, Australia: Trans-Pacific Press, 2011. 251 pp. \$89.95 (hb). ISBN 978-1-92090-133-2. Web site: www.transpacificpress.com.

天野郁夫 (Ikuo Amano) 是日本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 他于1981年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现在被翻译成英文。作者追踪了日本教育界学生选拔系统的发展, 讨论了公共考试体制, 总体上分析了日本文凭主义的发展史。

Biggs, John, and Catherine Tang. *Teaching for Quality Learning at University*. Maidenhead, UK: Open Univ. Press, 2011. 389 pp. (pb). ISBN 978-0-33-524275-7. Web site: www.openup.co.uk.

这是一本被广泛使用的教学质量手册 (第四版), 既指导了如何提高教学质量, 也探讨了教学过程涉及的主要问题。该书致力于设计以效果为基础的项目并讨论了其他主题。

Capshaw, James H. *Herman B. Wells: The Promis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 Press, 2012. 480 pp. \$35 (hb). ISBN 978-0-253-35720-5. Web site: www.iupress.indiana.edu.

威尔斯 (Wells) 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巨人”之一, 曾担任印第安纳大学校长63年。这本传记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 并讨论了学术发展中领导层的角色。

Davies, Martin, Marcia Devlin, and Malcolm Tight, eds. *Interdisciplinary Higher Education: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ities*. Bingley, UK: Emerald, 2010. 349 pp. (hb). ISBN 978-0-85724-371-3.

该书收录了跨学科研究的相关文章。涉及的主题包括发展学生的跨学科技能、从跨学科角度开展卫生研究、环境课程设计等。

Fethke, Gary C., and Andrew J. Policano. *Public No More: A New Path to Excellence for America's Public Universiti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2012. 262 pp. (hb). ISBN 978-0-8047-8050-1. Web site: www.sup.org.

作者讨论了美国公立高等教育近年来的变化,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公共经费的明显下降。他们呼吁给予公立大学更多的财务和行政自治, 建立更强大的行政管理等。

Fitzgerald, Tanya, Julie White, and Helen M. Gunter. *Hard Labor? Academic World and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Higher Education*. Bingley, UK: Emerald, 2012. 205 pp. (hb). ISBN 978-0-78052-500-6.

书中一系列文章指出, 与其他国家相比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学术工作环境近年来已经恶化。这些负面变化很多与公司的治理模式、市场化以及新公共管理在大学中的实施有关。

Fuller, Alison, Sue Heath, and Brenda Johnston, eds. *Rethinking Widening*

Particip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164 pp. (pb). ISBN 978-0-415-57564-5.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education.

本书是一个以英国为基础的研究，评估了社交网络——如家庭、合作伙伴和朋友——与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相关性，涉及了该话题的方方面面。

Ginsberg, Benjamin. The Fall of the Faculty: The Rise of the All-Administrative University and Why It Matters.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2012. 248 pp. \$29.95 (hb). ISBN 978-0-199782444. Web site: www.oup.com.

这本书是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角度撰写的，但其主题却与全球都有关。作者认为，研究型大学传统上受益于“共同治理”，即教师有相当的权威；但近年来，权力基本割让给了行政管理人员，因此阻碍了大学的发展。

Hartman, Eva, e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owards a New Research Agenda in Critical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151 pp. (hb). ISBN 978-0-415-67227-6.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education.

一系列论文从批判的角度讨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主题包括从后殖民的角度看巴西的高等教育、南非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国孔子学院、英国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和公司化等。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orld 4: Higher Education's Commitment to Sustainability - From Understanding to Action.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341 pp. (pb).

ISBN: 978-0-230-53555-8. Web site: www.guninetwork.org.

这是全球大学创新网络年度丛书的第四本，专注于讨论（社会和生态意义上）“可持续性”的诸多问题。书中各章讨论了可持续性和全球危机相关的广泛主题，在此之前还探讨了各地高等教育的现状。

Kezar, Adrianna, ed. Embracing Non-Tenure Track Faculty: Changing Campuses for the New Faculty Major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232 pp. (pb). ISBN 978-0-415-89114-1.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education.

该书主要关注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大学大多数新的学术任命不是传统的“终身教职序列”。书中主要关注非终身教职序列的教师，讨论了如何将这些学者最佳地整合进美国和加拿大的学术机构中。

Kupfer, Antonia, ed. Globalization, Higher Education, the Labor Market, and Inequ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230 pp. (hb). ISBN 978-0-415-69346-2.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education.

本书专注于全球高等教育不平等和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议题，讨论了澳大利亚和英国学费的影响、性别不平等和高等教育职业、日本的文凭贬值、新西兰的教育不平等和改革等。很少有论文涉及全球化。

Locke, William, William K. Cummings, and Donald Fisher, eds. Changing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Academy.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2011. 390 pp. \$139 (hb).

ISBN 978-94-007-1139-6.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education.

www.springer.com.

这是《变化中的学术职业》研究系列的第二卷，主要调查了世界各地学术职业的态度。这本书专注于学术职业的意见，涉及治理、管理以及学者眼中的行政管理人员。书中搜集了十几个国家的案例研究，还有一些比较分析章节。

MacFarlane, Bruce. *Intellectual Leadership in Higher Education: Renewing the Role of the University Professor*.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160 pp. (pb). ISBN 978-0-415-56082-5.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education.

作者专注于资深教授，资深教授是任何一所高校大学的核心，他们却在当前有关创业精神和全球化的讨论中被大大忽视了。他认为，教授的各种角色，如教师、研究员和学术公民，需要更好的理解和精心培育。

Martin, Robert E. *The College Cost Disease: Higher Cost and Lower Quality*.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11. 198 pp. \$99.95 (hb). ISBN 978-1-84980-616-9. Web site: www.e-elgar.com.

书中批评了美国高等教育学费成本的增加，尤其是保守的决策者和经济学家的看法。这本书清晰的指出，学费近年来没有必要增长；并进一步指出，随着价格上升质量下降了。

Mart ínez-Alem án, Ana M. *Accountability, Pragmatic Aims, and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136 pp. (pb). ISBN 978-0-415-99163-6. Web site:

通过哲学和历史视角，该书分析和论述了美国研究型大学中教学观点和问责制的变化。作者运用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哲学，支持了传统的学术价值，批评了当代管理趋势。

Molesworth, Mike, Richard Scullion, and Elizabeth Nixon, eds. *The Market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Student as Consum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245 pp. (pb). ISBN 978-0-415-58447-0.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education.

为了解释英国高等教育中，市场力量是如何出现的以及这些力量如何塑造了现在的高等教育，作者对这个有争议的话题采取了一种平衡的观点。书中探讨的主题包括学生的角色——市场化大学中的“消费者”、树立品牌、学生生活的政治经济学等。

Pannikar, K. N., and M. Bhaskaran Nair, eds. *Globaliz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India*. Delhi: Pearson, 2012. 266 pp. Rs. 799 (hb). ISBN 978-81-317-6116-8. Web site: www.pearsoned.co.in.

该书讨论了印度高等教育中的诸多重要议题，其中一些直接关系到全球化问题，主要关注印度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知识社会的发展、知识产权、公私合营的伙伴关系、少数民族权利和高等教育等相关问题。

Pelfrey, Patricia A. *Entrepreneurial President: Richard Atkinson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5–2003*.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233 pp. \$49.95 (hb). ISBN 978-0-520-27080-0. Web site:

www.ucpress.edu.

该书分析了理查德·阿特金森 (Richard Atkinson) 在加州大学担任校长的经历, 通过讨论几个危机和学术领导层的回应, 为管理一所复杂和杰出的大学系统提供了洞见。

Peterson, Patti McGill, ed. *Confronting Challenges to the Liberal Arts Curriculum: Perspectives of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al Countr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247 pp. \$46.95 (pb). ISBN 978-0-415-50606-9.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education.

该书是第一本对全球博雅教育进行全面分析的书, 重点关注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本论点是, 博雅教育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在学生的创造性和批判性思考中都扮演着关键角色。这本书提供了一些关键国家的案例研究, 包括中国、南非、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土耳其等。

Pierce, Susan Resnick. *On Being Presidential: A Guide fo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eader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12. 208 pp. (hb). ISBN 978-1-118—2776-9. Web site: www.josseybass.com.

该书论述了美国大学校长面临的复杂情况和挑战, 讨论了筹款、治理委员会关系、多面的校长角色等主题。该书是基于一位大学校长和顾问的经历写成。虽然该书与美国的体制有关, 却也涉及其它一些国家。

Pinheiro, Rómulo, Paul Benneworth, and Glen A. Jones, eds. *Universiti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ensions and Contradic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265 pp. \$170 (hb). ISBN 978-0-415-98355-8.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education.

基于高等教育商业和经济作用不断增长的假设, 本书探讨了大学扮演的区域角色, 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和其他角色。大多数章节讨论了波兰、摩尔多瓦、智利等国家。涉及了大学对农业发展的作用等主题。

Pusser, Brian, Ken Kempner, Simon Marginson, and Imanol Odorika, eds. *Universities and the Public Sphere: Knowledge Creation and State Building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261 pp. \$160 (hb). ISBN 978-0-415-87847-0.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education.

一系列文章批评了全球高等教育中新自由主义的趋势, 涉及国际学生、国际学生市场、日本排名、芬兰国立大学的公司化、南非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义重组等。

Sutin, Stewart E., Daniel Derrico, Rosalind Latiner Raby, and Edward J. Valeau, eds. *Increas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munity College Financial Model: A Global Perspective for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Palgrave, 2011. 296 pp. (hb). ISBN 978-0-230-10536-2. Web site: www.palgrave.com.

虽然这本书的副标题表明它拥有全球视角, 但绝大多数章节都围绕美国, 只有一些作者用国际化视野分析材料。该书对社区学院的重点关注很有价值, 因为这方面鲜有研究。讨论的主题涉及资源分配和规划、设施管理、资金问题等。案例研究包括中国、英国和美国的几个州。

Temple, Paul, ed. *Universities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Higher Education and*

Global Change.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247 pp. \$170 (hb). ISBN 978-0-415-88466-2.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education.

本书的重点是大学作为知识创造者和传播者的角色,包括大学在非正式知识经济中的角色、知识经济时代中的中国高校、大学及其对区域经济的贡献、校企合作关系的管理、大学组织和知识生产等。

Wankel, Charles, and Agata Stachowicz-Stanusch, eds. *Management Education for Integrity: Ethically Education Tomorrow's Business Leaders*. Bingley, UK: Emerald, 2011. 259 pp.(hb). ISBN 958-1-78052-068-1.

本书的重点是管理教育中的道德规范,

为之提供了宽广的视角,主要是美国视角。讨论的主题包括超越不道德的商业课程、管理教育中的道德框架、道德承诺、西班牙商业教育、中国的诚信意识等。

Wankel, Laura A., and Charles Wankel, eds. *Higher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with Social Media*. Bingley, UK: Emerald, 2011. 283 pp. (pb). ISBN 978-0-85724-651-6.

本书讨论了“如何”在大学管理中使用社交媒体,如 Twitter、Facebook,并分析了高等教育使用社交媒体的几个方面。讨论的主题包括招生管理中社交媒体的使用、辅导和指导学生时社交媒体的使用、校友关系维护中 twitter 的使用等。虽然大部分的例子基于美国本土,但可能有更广泛的相关性。

